

# 论北魏宗王政治与有限皇权的短暂发展

周中军

**摘要** 建立在草原武装基础上的北魏拓跋政权,由于初期受鲜卑异姓军功贵族的影响,皇权不能完全行使。因此中期历史主要以孝文帝改制为契机,确立宗王政治占主导及专制皇权独立权威的时期。但宗王政治毕竟不能等同于皇权政治,二者必然发生矛盾。

**关键词** 有限皇权 鲜卑异姓贵族 宗王政治 士家大族 北魏

自道武帝据有中原建立政权,部落联盟经历了“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蜕变期之后,逐渐发展到了封建国家,部落酋长被纳入到封建政权体制中。初期部落的来源和异族的统治格局,决定了其具有不同于南朝的政治特点,最明显的特征是鲜卑军功贵族集团左右着专制皇权的发展,使皇权不能自主。

此时的政治体制具有浓厚的贵族政治色彩。鲜卑王公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的特权,通过封爵的形式确定下来。《文献通考》卷二三七《后魏诸侯王列传》:“元魏时,封爵所及尤众,盖自道武兴于代北,凡部落大人及邻境降服者,皆封以五等,令其世袭,或赐以王封。”因此鲜卑异姓贵族作为征服者,在王位继承、军事征讨、政治事件处理等决定中发挥着影响力,但宗室诸王与异姓王公并无绝对优势。永兴三年,“诏南平公长孙嵩、任城公嵇拔、白马侯崔玄伯等坐朝堂,决录囚徒,务在平当。”<sup>[1]</sup>士家大族作为被征服者,为保护宗族的利益,先后与异族统治者合作,利用其先进的文化改造异族落后的制度,使其不断融入华夏文明,并借此实现心中的汉魏制度。但在胡人占主导的情况下,结果往往相反,因崔浩“国史案”北方世家大族受到自永嘉之乱后的再次冲击,史称:“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sup>[2]</sup>陈寅恪先生也断言:“杀崔浩者,必为鲜卑酋长,可以无疑。”<sup>[3]</sup>左右皇权的异姓王公贵族和宗室,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所谓的“勋臣八姓”和“帝室十姓”。他们在北魏历史中粉墨登场,影响着皇权的行使。

## 孝文改革与皇权独立

北魏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有限皇权试图摆脱贵族控制而确立自身的权威,并转而限制贵族的特权。这主要是以孝文帝改制为代表。

孝文前期,冯太后主政,汉族士人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赵郡李奕兄弟、陇西李冲“虽以才进,已由私宠”<sup>[4]</sup>、太原王睿“因缘见幸”<sup>[5]</sup>,先后被提拔委以大任,是此时士族因内宠升迁的真实展现。崔浩时未实现的理想即致力于“分明族姓”、“整齐人伦”、“复五等之爵”,实现其恢复汉魏门第制度的理想,此时正逐渐施行。汉族士人在官制和爵位上突破了旧有的制度框架,打破了政治势力间固有的平衡,也就使皇权有了独立运转的条件。

孝文帝临朝,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首先太和十六年(492)“改降五等”即“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sup>[6]</sup>。缩小贵族的范围,减少异姓王公的特权,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传统认识中的变革爵制。

拓跋宗王得以确立高于鲜卑异姓王公的独尊地位,献文诸王(咸阳王禧、赵郡王干、广陵王羽、高阳王雍、北海王祥、彭城王勰)得以出镇要藩和进入机要。从万斯同《元魏将相大臣年表》和《元魏方镇年表》中发现,无论令仆之选还是方伯之任,北魏前期由异姓王公所分掌的权位,在太和年间多为宗室取代。宗王反过来又支持皇权。可以说宗王权重便意味着皇权的伸张<sup>[7]</sup>。

迁都洛阳是皇权摆脱贵族控制的一次非常之举。史称“高祖乃独谓澄曰:‘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sup>[8]</sup>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高祖曰:“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尚书左仆射。及驾幸洛阳,定迁都之策,高祖诏曰:“迁移之旨,必须访众。当遣任城驰驿问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近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伏。澄遂南驰还报,会车驾于滑台。高祖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sup>[9]</sup>文中所书平城(今大同市东北)所处的地理位置为草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界处,旧势力占主导地位,是拓跋进入中原的桥头堡,这也是前期改革不成功的一个原因。到孝文帝时,鲜卑拓跋汉化日益加深,北人华化现象出现。其次,洛阳文化浓厚,为数朝帝都之所在。为了更好的行使皇权和确立拓跋政权的正统地位,孝文帝决定南迁。从对待太子恂“欲召牧马轻骑奔代”的叛逃举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孝文帝壮大皇权的决心,“……今恂欲违父背尊,跨据恒朔。天下未有无父国,何其包藏,心与身俱。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脱待我无后,恐有永嘉之乱”<sup>[10]</sup>。

其次,孝文帝大力推行“士族化”,扶植“四姓”即崔、卢、郑、王。评定的标准是按照汉族旧籍门第以及与皇室的婚姻。任何行动都必须与门第相一致,史称:“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禧取任城王隶户为之,深为高祖所责。诏曰:‘……然则婚者,合二姓之好,结他族之亲,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必敬慎重正而后亲之。……长弟咸阳王禧可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干可聘故中散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陵王羽可聘骠骑谥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雍可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sup>[11]</sup>其结果是政治联姻建立了外戚集团与宗室集团共同支撑皇权的格局。分定姓族,标志着北魏新门阀体

制的确立,而这一体制兼有士族制与贵族制的双重性。

总的来说,“改降五等”、“迁都洛阳”和“士族化”确立了宗王以武力拱卫帝室,汉族士人以文化辅佐王权的体制,保证了太和改制的顺利进行。当太和改制完成后,一个包括鲜卑勋贵和士家大族在内的新门阀秩序建立。在王权体制和门阀秩序下,汉人士族出任将相的比例明显提高<sup>[1]</sup>,鲜卑异姓贵族地位势力在下降。但据另一统计,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二大(大司马、大将军)、尚书录令仆射、侍中及领军、护军等拥有实权之职,鲜卑贵族在孝文帝一朝占68%,在宣武一朝占67%,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宗室的比,由36%上升到56%了<sup>[2]</sup>。

宗室地位的提高,还可从孝文辅政人选看出,《魏书·高祖纪下》:“诏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详为司空公,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为尚书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公禧,尚书右仆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辅政。”表明异姓王公被排除在中枢之外。宗王政治崛起的结果则是“六辅”佐政的破产,影响皇权的发挥。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当宗王政治高于皇权政治之时,也就是其衰败的开始。

## 宣武灭王与皇权的没落

孝文改制后,鲜卑勋贵开始分化为兼有一定文化色彩的上层高门和以武干自达的下层武人,前者与汉族士人中的高门甲族合流,并在宣武灭王和北魏末年的“河阴之变”中受到两次毁灭性打击;后者则失去了作为贵族的基本特权,长期被排斥于“清流”之外,成为北魏末年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

“世宗初,六辅专政,后以咸阳王禧无事构逆,由是遂委信肇。”宣武帝不能忍受孝文朝所形成的强大的宗王政治,改用外戚高肇作为自己手中的棋子来抗衡,“肇既无亲族,颇结朋党,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详位居其上,构杀之。又说世宗防卫诸王,殆同囚禁。”及京兆王愉出为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轨,肇又赞杀彭城王勰。<sup>[3]</sup>宗王势力受到打击。延昌三年(515)“大举征蜀,以肇为大将军,都督诸军为之节度”。企图通过军功来提高其政治资本。但宣武帝死去后,“肇承变哀愕,非唯仰慕,亦私忧身祸,朝夕悲泣,至于羸悴”。高肇没有了皇权的支持和政治能力,所以很快就被诛灭了。

宗王政治第二次冲击是武泰元年(528),地方酋帅豪强尔朱荣发动的“河阴之变”。《魏书·尔朱荣传》载:“朝士既集,列骑围绕,责天下丧乱,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缘此等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纵兵乱害,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余人。皇弟、皇兄并亦见害,灵太后、少主其日暴崩。”“河阴之变”的实质是一场地方豪帅实力派反对中央胡汉士族当权派的斗争,被杀的大多是魏廷中央胡汉士族官僚。河阴之变,造成了留在洛阳的宗室和士家大族彻底崩溃。武人集团再次抬头,形成晋阳武功控制首都洛阳文治的局面。孝庄帝说“今玺运已移,天明有在,宜时即尊号”,皇权彻底沦丧。最终下层武力集团战胜上层文治贵族。

以宇文泰为首的代北武川豪强酋帅集团和以武功苏氏、陇西李氏等有武力的士族,控制了关中,推行鲜卑化,建立了西魏、北周;出身渤海大族的高欢则另立孝静帝,迁都邺城,拥有关东世族的支持,建立东魏、北齐。隋唐承北周事业,以武力统一全国。陈寅

恪指出:“宇文泰以‘关中本位政策’创建霸业,隋唐因之,遂统一中国,为极盛之世。”<sup>[4]</sup>又说:“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吻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sup>[5]</sup>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益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sup>[6]</sup>,说的正是鲜卑武人集团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 小结

秦汉四百年为皇权政治,因而是政治统一时代;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皇权陵夷,因而是政治分裂时代。北魏初期的皇权受贵族政治的影响,其政治权力是不完整的。中期孝文帝通过改制所建立的王权体制,确立了皇权短暂的春天。其摆脱了异姓王公的影响,但却无形中促成来自血缘之内的威胁即宗王政治。宣武帝以外戚对抗宗王的尝试,是最高层统治家族的内讧,其结果是以两败俱伤收场。专制皇权匆匆建立,又匆匆离去,昙花一现。这恰恰给了地方酋帅一个可乘之机,尔朱荣集团武力的崛起说明这一点。从中华帝国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北魏的贵族统治是“变态”。“常态”应该是士大夫政治和在此基础上完整的皇权。孝文帝的改制是皇权独立的努力,但历史结果最终退回军功贵族统治。隋唐帝国建立,军功贵族才逐渐向士人官僚转化。民间普通士族通过科举入仕形成的“进士集团”,标志着士人官僚的再度崛起,帝国才真正回归“常态”,皇权专制到此才得以真正确立。

参考文献:

- [1](北齐)魏收.魏书·太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84.
- [2](北齐)魏收.魏书·崔浩传.北京:中华书局,1984.
- [3]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4](北齐)魏收.魏书·李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84.
- [5](北齐)魏收.魏书·皇后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4.
- [6](北齐)魏收.魏书·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84.
- [7]陈爽.“分定姓族”与太和改制的遗留问题.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0.
- [8](北齐)魏收.魏书·任城王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84.
- [9](北齐)魏收.魏书·废太子庶人恂传.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0](北齐)魏收.魏书·咸阳王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1]刘琳.北朝士族的兴衰.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12]王军.孝文帝定族姓后北魏各阶层政治地位研究.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2.
- [13](北齐)魏收.魏书·高肇传.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4][15]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1956.50.48.
- [16]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9.

周中军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责编 高生记)